

# 在别处,书写时代留下的刻痕



袁凌 受访者供图

今年初,作家袁凌出版了散文集《在别处》。从小说集《世界》到非虚构作品《寂静的孩子》等,袁凌一直通过聚焦个体生活境遇,折射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生存状况。这一次,他将视角转向了自己。

“70后”袁凌生长于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的一个村庄,他经历过物质的匮乏、家庭的分崩离析,目睹了城镇化过程中遽变的乡村,体会过“北漂”的焦灼与孤独,也在蓦然回首时发现已无“家乡”可归。袁凌同时是一位前调查记者、非虚构作者,在多年的工作中,走访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的当事人。在新作中,他以真实细腻的笔触书写了自己这些年的生命记忆与情感,呈现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。

“希望能通过我的记录,唤起有相同记忆的人的一种共通感。”袁凌说。

现代快报+ZAKER南京记者 张鑫仉

## 1

有一段时间,袁凌活在一种愧疚与失败相交织的感情中。这种复杂的感情既关乎“乡愁”也关乎文学理想。

2005年,袁凌时任某门户网站新闻中心副总监,主流意义上的成功人生近在咫尺。但从小就怀揣文学梦想的他,却感到负罪与不安,“在文学方面我有自己想要达到的高度,如果没有达到,在别的方面越成功,越让我觉得难受。”

也正是本世纪初的那几年,传统乡村在城镇化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袁凌一直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,这不仅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念旧的人,另一方面也出于他对母亲的愧疚。袁凌的母亲是一个普通农民,为袁凌付出了很多。袁凌总是想在成年之后能够孝敬母亲,然而在跨进大学门槛的前几天,母亲去世了。袁凌将对母亲的情感投射到了乡土之上。

因此,袁凌自述回乡时看到打山打洞、断壁残垣、清澈的河流修了直排厕所,“那个感觉真的是死了一样。”他迫切地感到自己需要到场、需要写作。

袁凌辞去工作,回到家乡,打算扎根乡土写作,这也因为他推崇陶渊明式的中国古典美学理想,生活与文字的统一,“我觉得文学不是一种修辞,它应该是一种行为伦理。人的生活和文字应该合一,不应该是一种分裂的状态。”袁凌说。

但袁凌的回归终究是失败了。一方面,作为现实根基的乡村已经在习俗、物质各个层面发生了变化,故乡已不再是记忆中的“桃花源”,另一方面,袁凌也面临生活的困境,“因为没有生活费,我当时的写作又发表不了,没有什么名气,找不到出路。周围的人眼光也都不理解你,觉得你上过大学,你跑回来待着干什么。后来自己的心理压力也比较大,我也不够坚定,最后就离开了家乡。其实我是一种很失败的感觉。”

又一次离开家乡,对故乡的情

结更沉重地压在了袁凌的心上,让他喘不过气。这些年,袁凌把文字当作自己安生立命的根基,通过写作纾解自己漂泊中的乡愁。从《我们的命是这么土》到新作《在别处》,袁凌坦言,感到对家乡的歉疚和负罪感终于得到了缓解。

## 2

近几年,凭借《青苔不会消失》《生死课》《寂静的孩子》等非虚构作品,袁凌获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与认可,也获得了一些非虚构领域的奖项。

在《寂静的孩子》一书中,袁凌将视线转向那些留守、辍学、单亲的城乡儿童,记录了他们在困顿的境遇中艰难挣扎却顽强成长的生存境况。为了完成这本书,在四年的时间里,袁凌走访了内蒙古、新疆、贵州、四川等十余个偏远省份的近百位受公益计划救助的孩子。

袁凌和摄影记者一般会到一个孩子家里住四五天,给对方四五百块钱。长途跋涉、环境艰苦自不必说。没有厕所,住的是硬板床,往往吃饱已经很难,更不要谈食物如何了。有一次,睡在一个彝族家庭的阁楼,夜晚下了暴雨,雨水顺着屋顶流淌进来,袁凌摸出斗篷盖在头上过了一夜。

除了生活中的不适,让袁凌倍感压力的还有如何真正走近采访对象,取得他们的信任,“要注意如何与他们对话,要一直注意他们的表现,保持一个关注度,还是相当累的。各方面有很大的压力。”内忧外患,在甘肃走访的时候,袁凌的血压一度升到180多,胃病、甲状腺切除也接踵而至。

尽管走着走着,袁凌愈发觉得“身体这个机器不太好用了”,他还是坚持了下来,这出于一种责任感,也出于一种生命的紧迫感,“当时做记者也是这样的,你做一个事情还是应该把它做完。再加上我总觉得人生无非就是过程,任何人都是短短几十年,你能够有个事做,然后做完了,我还是觉得挺不容易的。生命

不一定是时间长就好,我现在也有这种时间紧迫的感觉,希望赶紧做些什么。就好像欠了一笔账,没有还清,你会有很大的负担。”

## 3

特稿、小说、非虚构,变的是体裁,不变的是袁凌对当今普通个体生活的关切。在《在别处》中,袁凌书写了很多已经被遗忘的日常生活的细节,在火车站害怕被拐走的惶恐、在超载的面包车上惴惴不安……在袁凌看来,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所谓的“大问题”,有的是这些真实的个体生活。

“所谓的‘大问题’,都是似是而非的,很难把握。我现在去看那些家族史什么的,都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我们的认识,实际上还处于很迷茫的状态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小世界,在这个小世界里,你可以活得很明白、很细致,但一旦放到更大的范围里,你根本把握不住什么东西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每一个卑微的个体才有它的独特意义。我就把一个人的命运,以及他对我的意义平等地记录下来,这就是我现在的写作态度。”

正是从这个意义上,袁凌赞同米兰·昆德拉的说法,历史不是于大的地方参与生活,是于细节处参与生活。在《可笑的爱情》中,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约会,因为男孩穿了一条老式的内裤,而导致约会的失败,这也是男孩一辈子失败的开始。“历史在那一刻强制性介入了他的生活,侵犯了他。”袁凌说。

时代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参与了我们的生活,所以在袁凌看来,时代与人应该是相互记录的关系。“时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留下刻痕,这种刻痕比人性的变幻、情绪的起伏、情感的爱恨都更加真实。因为这些刻痕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的那种场景下,然后逐渐形成今天的我们。没有过去的我们,就没有今天的我们。希望能通过我的记录,唤起有相同记忆的人的一种共通感。”

伏、情感的爱恨都更加真实。时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留下刻痕,这种刻痕比人性的变幻、情绪的起

## 对话

### 非虚构是一种精神

读品:为什么近几年创作的精力更多放在非虚构写作上?

袁凌:这与我个人的天赋和职业经历都有关系。我是想象力缺乏,感受力丰富的那种人,所以写作倾向于在真实的细节上打开文学空间,而不是去虚构情节、人物、对话。天然地,我可能更适合去写非虚构。然后我做了13年调查记者,记者这个职业就是强调对现实的关切和真实感,反映在我的文字里就会越来越强调语言的节制和真实的东西,而当代小说好像特别需要很多情绪和泡沫的东西。这两方面造成我比较适合写非虚构。实际上,我也不是只能写非虚构文体,我认为非虚构是一种精神,它贯彻到所有文体中去,所以我也写小说、诗歌,我希望能够用非虚构把所有文学的文体打通。

读品:这几年,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多,非虚构文体受到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。你如何看待国内当下的非虚构写作?如何评价自己的非虚构写作?

袁凌:现在的非虚构有好几部分。一部分是特稿,它是一个“外来产品”,用一种把日常生活陌生化的视角来观察日常生活。另一部分是题材式的非虚构写作,比如梁鸿的“梁庄”系列、黄灯的《我的二本学生》、“三和大神”,这些是以文学性为辅、以题材性为主的非虚构写作,社会意义更大。

我的非虚构写作其实文学意义大于社会意义、题材意义。尤其《在别处》这样的写作,它比较私人,谈不上有多大的典型的社会意义,它的文学意义会比较强。同时,从个人的经历中也能折射这个社会、时代的一些变化、脉络和印记,因此也有一定社会意义。这个社会意义是在文学的前提下表达出来的,而且这种表达不是陌生化的表达。从我们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,从我们日常的感受出发,从我们的记忆出发,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回顾和关注自己的生活,而不是借用外来的观念和眼光来进行一种剖析,进行一种陌生化、看起来“零度”实际上是“上帝视角”的、把中国发生的事看作一种象征、寓言的方式来写,所以我的写作更多是一种本土的、“内生化”的写作,这也是我的一种方向。

读品:走访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情感震动的时刻,你在书中都描写得很克制。实际的走访过程中,如何处理现实带来的震撼?

袁凌:心里可能非常地震动,有很多感触,但是你不会表达出来,尽量地接纳下内心的震动,慢慢地把它熔构成型,最后化为文字。就像水库一样,我们不能是一泻无余,而是先把雨水积蓄起来。你把水堵起来,暗地里非常大的水压,但是看起来是平静的,通过闸门释放出来的,它才能够发电。所以我们的文字看起来是平静的,但是你能感觉到平静下面的惊心动魄。我觉得最好的文字可能就是内敛而有力量文字。

读品: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?

袁凌:可能我是有某种悲观。但这是认识论层面上的一种悲观,而不是对生命的消极。鲁迅也很悲观啊,但是他很积极的。因为我们可能认识到了这个生命的本质的一种悲剧性,或者说一种沉重,一种不可解决,反而在这种前提下,我们可以去认真生活。在认识到的有限性的前提下,去做我们能做的一些事。



《在别处》  
袁凌 著  
天地出版社  
2021年1月



袁凌

1973年生于陕西,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。作品先后入选新浪十大好书、华文十大好书、《南方都市报》十大好书、两届豆瓣年度作品等。已出版诗集《石头凭什么呼吸》,非虚构作品《寂静的孩子》《青苔不会消失》《我的九十九次死亡》《生死课》等,同时在多家杂志发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思想随笔数十万字。